

我是我灵魂的舵手

□叶 梅

伊莎白·柯鲁克,一个伟大的女子。

一个将一生与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百岁老人,中国革命的参与者、见证者,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近日读到由天地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我用一生爱中国》,作家谭楷情感厚实、文笔畅达地书写了伊莎白·柯鲁克这位百岁女性的感人故事,让人久久沉浸于全书描写的情景之中不能自拔。伊莎白·柯鲁克与丈夫大卫·柯鲁克一生的理想追求与忠贞爱情,带给读者无尽的思考。

从书中可以看出,作家谭楷为写作此书,经过详细深入的采访、开掘,掌握了大量史料,动心动情,下足了功夫。《我用一生爱中国》的故事丰富翔实、生动鲜活。读这部书,几乎是在读一部中国连接世界的近现代史,作家谭楷对所拥有的素材进行了巧妙剪裁与结构,还原了伊莎白·柯鲁克这位传奇女性与丈夫大卫·柯鲁克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生命历程。

伊莎白·柯鲁克诞生于中国成都,父母来自加拿大。伊莎白·柯鲁克的中国名字叫饶素梅,她从小活泼好动,敢爬上房顶玩耍,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在成都华西坝子的“大课堂”里认识中国,并开始了一生的梦想。她从想成为一名人类学者,不畏艰险探访藏彝走廊,走向咆哮的杂谷脑河,在中国历史文化长廊中穿行,到相遇爱情,夫妻双双奔赴二战战场,受到白求恩、斯诺等人的影响又重返中国,投入抗战的烽火,再到从南海山至天安门,见证解放军进入北平,见证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成为中国第一代英语教学的拓荒者。伊莎白·柯鲁克与丈夫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

作家谭楷没有仅仅停留在人物命运的书面上,《我用一生爱中国》一直在追寻伊莎白·柯鲁克这位女性的精神世界。父母传递给她和平与仁慈,同时,她自幼便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金发碧眼的她对此深感兴趣。年轻时她在许多中国学者、不同民族百姓的帮助下,一次次攀越“鸟道”、“飞过”岷江,去了解中国西南村寨“云朵上的民族”。在那山峦之中,不仅蕴藏着人类学之谜,考古学之谜、气象学之谜、生物学之谜,还蕴藏着中国工农红军之谜。而在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她进一步领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认识到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无知”,她手握钉耙,走访上百家,感受抗战时期川东农村的苦难、愚昧和贫穷。当她又一次踏上

华北辽阔的土地,进入解放区,见到了“比传说中的还要美好”的新世界之后,从此心中埋下了“我们必须留在中国”的种子。谭楷的笔触一次次走进伊莎白·柯鲁克的内心,细腻而又真实地再现了她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理解,更展现出这位具有深厚学养的学者对人生的理性选择。正如伊莎白·柯鲁克在她103岁生日时,面对亲友背诵英国诗人威廉·亨利的诗《无敌》中的诗句:“我是我灵魂的舵手”,她对中国的挚爱来自于灵魂深处,被一种坚定自信的理想所支撑。

《我用一生爱中国》同时还写出了跨越国界和种族的人间真情,表达了不同民族间的善良相通、正气相融。当年藏族翻译索囊仁清曾陪同伊莎白·柯鲁克翻越松茂古道关隘进入藏羌村寨,80年过去了,她清晰地记得:“索囊仁清这个人非常喜欢开玩笑,很会摆龙门阵,跟他一起走,不觉得累。”十里河的农妇郭锦荣成为这个金发女子的干妈,为她操心,为她担忧。跟随伊莎白·柯鲁克全家20多年的阿姨刘金凤,与他们风雨同舟,患难时仍不离不弃。更有一起采访、共同研究并写作的挚友俞锡玑,在学术上并肩而行、相濡以沫……无数中国人给了伊莎白·柯鲁克夫妇及子女铭记在心、难以忘怀的温情,以至她在104岁高龄时,仍然带着儿孙千里迢迢回到成都,去看望母亲当年创办的小学校,重上儿时曾经攀爬的白鹿顶,回顾和重温家族六代人的中国情。书中写到当老人重返那所母亲创办的小学校时,人们在校门前电子屏幕上早就录入了一行温暖的大字:“伊莎白奶奶,欢迎您回家。”这所小学在经历近百年的变迁中几度更名,终于在2019年经政府批准,恢复“弟维小学”校名,105岁的老作家马识途欣然题写了校名。马识途老人早年参加革命,经受过无数生死考验,百岁后仍一直笔耕不辍,写出了多部传世之作,也是被称作“国宝”级别的传奇人物。他为弟维小学题写校名,使他与伊莎白·柯鲁克这对经历不同、但同样有着坚定理想信念追求的老人机缘交织,堪称佳话。

从谭楷讲述的精彩故事中,读者可以理解伊莎白·柯鲁克的内心独白:“我没有那么伟大,就是每次都选择了中国,选择留在自己喜欢的地方,选择和喜欢的人民在一起。”她感谢父母把她生在中国,正是在这片富有真情,生养她、滋润她的土地上,她实现了自己的许多梦想,造就了不平凡的人生。她与丈夫虽然也历经风雨坎坷,但她真情不变,守护在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边,用小马扎上的教学迎接北京外

由作家谭楷创作、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我用一生爱中国》是一部近年来难得一见、颇具特色、读来让人难忘的人物传记。这部作品以107岁高龄的加拿大籍专家、教育家伊莎白为主人公,以伊莎白精彩丰富的百年人生尤其是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为经,以围绕着伊莎白的一些重要事件为纬,把伊莎白以及她的丈夫柯鲁克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革命的一生,完整、生动、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读之令人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伊莎白1915年出生于中国,既是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又是卓有成就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2019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伊莎白的多重身份以及在多个领域的成就,演绎了她传奇的人生。她对中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人类学家,她通过多次艰苦危险的田野调查、社会调查,写下了著名的社会学著作《兴隆场》以及《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兴隆场》全面客观地记录了抗战时期川东一个小镇璧山的生存状态,保存了大量当地社会生活的鲜活事例,也全面展示了抗战时期川东农村的苦难画卷,《十里店》则以伊莎白参加《人民日报》组织的土改工作队进行土改的经历,真实记录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阶段的社会变革,被誉为与费孝通《江村经济》并列的人类学先驱之作。通过创作这些作品,伊莎白了解了中国,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也同样需要从这些专著中去了解那个时期中国乡村的风土人情和中国社会鲜活生动的存在样态以及变革过程。作为教育家,她参与创办中央外事学校即后来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英语人才,成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桃李满天下。

伊莎白在中国的田野调查、社会调查,自然引出一个命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正当性。伊莎白的社会调查、田野调查大的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璧山兴隆场,一次是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十里店参加土改。这两次的感受于伊莎白而言是完全不同的。在璧山兴隆场,她看到,“那里的乡亲们心上像是压着石头,眉头总是皱着,面容和盆地的天空一样阴沉,而十里店的乡亲们,黧黑的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微笑,眼中闪耀着希望,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的期盼,也是对好日子的期盼”。这些都是她亲眼所见,与兴隆场形成鲜明对照。

伊莎白的一生就这样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她在中国经历了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再到新中国成立包括后来的“文革”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的个人史很好地折射出了新中国的革命史、建设史。土改她在现场,开国大典她在现场,她是中国每一次历史巨变的见证者、亲历者、参与者,因而本书对她一生的书写也是从一个他者的角度,反映了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国革命和建设所走过的道路,从中不难看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必然性,因而更客观更可信。该书通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发生的一切,特别有说服力。

伊莎白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原本不赞同使用暴力,而丈夫柯鲁克则认为中国沉疴已深,除了手术,也就是革命,无药可治,古老的百病缠身的中国正在接受一场外科手术,就是用革命的手段切除毒瘤。伊莎白后来渐渐放弃了自己的观点,特别是经历了食盐合作社的失败之后,她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准确了。

伊莎白的丈夫柯鲁克深受埃德加·斯诺和白求恩的影响,他读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了解到白求恩的事迹后,他开始向往中国,向往来到一个“比传说还要美丽的新世界”。1947年伊莎白和柯鲁克夫妇原本准备在中国待18个月,可没想到一待就是半个世纪,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磁铁牢牢吸引住了他们。“我用一生爱中国”,本书的题目很好地概括了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的选择,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爱,风雨百年,矢志不渝。这个爱产生于伊莎白·柯鲁克夫妇对中国人民苦难的深深同情,更产生于对中国社会和现实深刻了解基础上的政治认同。

作者谭楷年近80宝刀不老,脚力健,不辞辛劳,沿着伊莎白的人生足迹走了大半个地球采访搜集资料,下足了功夫,令人钦佩,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深厚的文学功底让人钦佩,语言简洁优雅,叙写每一件事,场景、过程、细节、动作均生动传神,读来仿佛历历在目,如亲临其境。这部书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图文并茂,很多文字和描写后边配有精彩珍贵的图片,如1939年伊莎白在八仙洞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当地人购买一匹纺车,在这段文字后边我们看到当年她即决定返回成都为当地人购买一匹纺车,在这段文字后边我们看到当年她从成都回来背负纺车怀抱溜筒,坐溜索从湍急的岷江水面上溜过时哈哈大笑的照片,非常有感染力。一本好书就是这样,总是会从各个方面抓住读者,给读者留下难忘的阅读体验。

国语大学的未来,培养了一批批国家急需人才,桃李满天下。即使退休之后,她还多次到边疆义务讲学,资助贫困生,促进中加两国的友好往来,更以人类学家的情怀,呕心沥血修改完成了《兴隆场》《十里店》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人类学、历史学的传世之作,为世界提供了认识中国乡村变迁的宝贵文本。

《我用一生爱中国》的书写笔力劲健,清新动人,体现了作家谭楷多年的深厚积累,以及对此书写作的全心投入。他十分注重细节的描写,不同环境的自然风光、生活场景、人物动作都有着贴切的再现,从而增添了全书的感染力。更重要的是,他旁征博引,具有宏阔的视野和多方位的观照,因此所记载的不仅是伊莎白·柯鲁克与丈夫,也是白求恩、马海德、阳早、寒春等一代国际友人与中国的深厚情谊,并由此体现出人类共有的对幸福美好的理想追求,写就了一曲优美激扬的生命之歌,一曲温暖全世界的国际友谊之歌。

2022年4月天地出版社出版的谭楷先生的《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是近期阅读中最令我感佩的一部书。

这部书讲述的主人公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性,伊莎白·柯鲁克出生于中国成都,在加拿大求学后又回到中国。她在多次个人选择中都选择了中国,一生热爱中国并将自己的知识和爱交付于中国人民。这部书写出了一个人的个体生命史和中国近现代民族史的交互性,个人史、家族史和民族史相互交织,宏大而生动,鲜活而蓬勃。更让人感佩的是它的叙述,朴素而细微,好像在讲述一个平常但绝不平凡的故事。它娓娓道来的语调令人愉悦。

近现代这100年的历史之于中国的意义是不寻常的,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中国在这100年的变化太大了,这毋庸多言,同样,伊莎白今年107岁,100多年来她多在中国度过,这就注定了其经历的不平凡。作为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同样也是它的书写者和记录者,伊莎白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见证了70多年来中国的新发展。

这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性,从彝族村子到藏山山寨,从成都的华西坝到重庆的兴隆场,再到河北的十里店,从父辈的华西协合大学到中央外事学校,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一直到2019年在人民大会堂获得友谊勋章,她的人生经历与生命里程是非凡的。全书使用散文化的笔法,借细节揭示这种非凡性,作者的书写极为节制,比如,写1949年10月天安门广场上,伊莎白和柯鲁克收到邀请参加开国大典,伊莎白刚刚做了母亲,她在观礼间歇还惦记着儿子,穿过东长安街到中央外事学校临时住所东交民巷去给孩子喂奶,作为母亲的那样一种责任,揭示了她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同时,作者还写到,她和她先生——同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柯鲁克先生一直生活在人民中间,他们深深地记住“人民”二字,并将自己的学识和情感献给中国人民,他们对乡村里贫困的农民如此,对大学学院里的好学上进的学生也是如此,“人民”是一个核心,是她的爱的起点,是她对中国发自内心热爱的一个核心点,就是说,伊莎白的爱是以此为出发点,当然也是归宿。这也是我们能够理解本书大量笔墨记述的她不计艰苦奔赴西南村镇做人类学调研的细节并为之感动的原因。如果不是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她是不会做到这些的。当然这种爱决定了她在数次人生抉择时都选择了中国,留在中国,融入中国,她爱这里的人民,她要为这里的人民服务,这部书以大量细节揭示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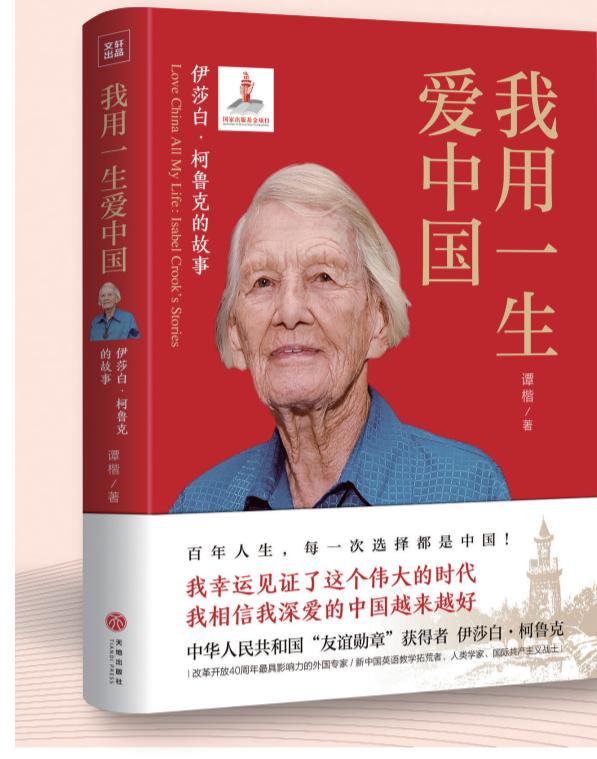
第二点,这部书写出了一个女性纯洁、坚毅的灵魂,和她对这一世界的基本认知与最高信仰。当然,我们从书中看到了中加友谊、友谊勋章、最高荣誉、杰出贡献、“新中国英语教育的拓荒者”、“为新中国诞生奋斗的一代国际友人”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尊重、值得尊敬、值得敬仰的。而这部书的最可珍贵之处还在于写出了一个1915年12月15日出生于成都都圣祠街的加拿大裔女孩子的成长,以及成长中美丽的灵魂。我举书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她年轻时奔赴中国西南部乡村,立志做一个人类学者而去乡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不超过二十岁出头,当然在那个村庄里,吃玉米粑粑、荞麦面、荞麦糊糊、酸菜面、烤土豆等生活的情景都是我们可以想见的,也是一个立志人类学研究的人的日常,但是她要从成都给八什闹买纺车,我们在书中第82页看到了1939年时年24岁的伊莎白,照片上她背着纺车坐溜索过岷江,她的身下就是波涛汹涌的岷江,但是她在跨越岷江的溜索上背着纺车,却在哈哈大笑,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她已然超出了一个人类学者所应做的,人类学者可能只是一个旁观者、访谈者、考察者、勘探者,而她不同,除了这些责任外,她还是一个理想主义学者。怀揣理想主义精神的她,身居困难、艰辛、贫穷之地,仍能这样乐观,仍能露出这般笑容,这恰是信仰的力量。信仰者为什么能够做到?因为她信仰这个世界是好的,信仰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这个细节写得太好了,它写出了一个人的信仰,而这个信仰是基于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这一世界的基本认知。所以说,我讲第一点作者写出了“人民”在伊莎白心中的位置,第二点作者写出了一个人的信仰,以及这个信仰在伊莎白精神中的位置。对世界能够变得更好的信仰,确实贯穿了伊莎白的一生。

第三,这部书写出了我们此前不曾认识到的——一位女性学者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伊莎白是儿童心理学专业出身,也曾受过社会人类学方面的教育,而在20世纪40年代,她也曾介入中国乡村建设运动、解放区的土改运动,那个时候,她不仅和同时代的中外人类学者、社会学家有过学术或生活上的交集,她研究早期的根须也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乡村大地的,这使她获得了对这一学科的不同于众的国际性视野,同时也使她在最基本点获得了这一学科所要求的第一手材料。她的著作《兴隆场——抗战时期的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文版,基于一个学者的认真严谨,她后来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书写和修改,出版了《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抗:兴隆场(1940—1941)》,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当然,这部作品是她与另一位学者合著,她和她的先生柯鲁克共同写作了《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1982年中文版出版。这些都是具有历史文献价值,而且具有人类学研究价值的著作。

这就是我要在此一再强调的这部书最重要的创新之处,我认为它写出了伊莎白革命者的一生,教育家的一生,同时也写出了伊莎白作为学者、研究者的一生,这是传奇的一生,也是脚踏实地的一生,是一个“勘探者”的一生,是对人类行为方式、心灵价值取向好奇而又负责任的学者的一生。

伊莎白女士的革命性和教育家身份,是政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层面的,是可见的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在书写中可以想见的。但是这部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不应忽略,就是它揭示了伊莎白作为人类学者的贡献,这个“学术的一生”是在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层面所凸显的光环下极易被忽略掉的,所以,作家谭楷很了不起,他抓住了传主的灵魂部分。传主这一部分的贡献之揭示,往往在大历史的移动中是“不可见”“不能想见”的那一部分,这是文明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传主作为人类之一分子,作为对人类的进步负有责任的人类学者之一分子,作为深深热爱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在中国生活了一辈子“用一生爱中国”的人中的一分子,这个学术的贡献不能被忽略和屏蔽。也就是说,伊莎白身上的确承载了近代、现代、当代的中国史,是一个人的生命史与一个民族的发展史相互交叠和融汇,是她的经历与贡献所致,但是她的经历和贡献最重要的方面还有她生命中落笔的部分,之于中国南方重庆璧山“兴隆场”的乡村研究,之于北方河北“十里店”的乡村研究,这些中国乡村的调查及研究,由于年代的原因已经不可复制,但它们会在时间中长久留存,供我们阅读了解。我的另一收获,就是要去中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找来对于“兴隆场”与“十里店”的历史录记的著作来读。我相信,这些基于爱的关注所写作的文字,理应受到学界的重视。

《我用一生爱中国》评论



把光荣镌刻在中国的伟大征程里

□李 航

2019年,新中国意气风发地迈入第70个年头。站在那个历史节点,每一位中国人都不会也不应该忘记,70年前,从旧世界走出来的中国,是怎样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70年来,新中国从来没有忘记与我们并肩携手的朋友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前夕,为表彰一腔热忱支持中国、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的六位国际友人,习近平总书记特向他们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这其中就有伊莎白·柯鲁克。

这位今天已经107岁的世纪老人,1915年出生于中国成都。在成都华西坝长大的伊莎白,从小就对中国这片土地产生了深厚感情。她在加拿大接受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后,回到中国四川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写出了人类学重要作品《兴隆场》初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伊莎白和未婚夫——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大卫·柯鲁克回到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并结婚。战争结束后,伊莎白和丈夫毅然选择返回战火纷飞的中国,在中国解放区参加了土改,并深入调查,写出又一部人类学重要著作《十里店》。她积极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成为新中国外语教学的拓荒者。她撰写了多部中国乡村调查的学术专著,对于在世界上传播中国故事、促进中外友谊做出了贡献。

近年来,伊莎白的感人事迹引起了中国人的广泛关注。人们钦佩她的才华与学识,叹服于她与百年中国休戚与共的命运,更赞美她与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在杖朝之年,作家谭楷写出了35万字纪实文学《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重要问题。《我用一生爱中国》是一部丰富丰盈的大书,谭楷在这部沉甸甸的书里,用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回答了这个问题——伊莎白·柯鲁克如何亲历中国百余年的历史巨变,如何见证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从创建到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历程。谭楷历时三年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他通过大量采访和实地考察,用一个个小故事和珍贵的历史图片,讲述了伊莎白·柯鲁克在中国成都华西坝的成长,在四川、重庆等地从事人类学研究,和丈夫大卫·柯鲁克一起到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并加入英国共产党,随后回到中国解放区考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投身英语教学、促进对外友好交流等丰富的百年人生经历。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曾说:“思想,就是推动自己和全人类的生活的力量。”是的,《我用一生爱中国》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书中时时充盈着的思想的力量。有人说,这是一部80岁的智者向107岁的智者致敬的作品。诚哉斯言!谭楷说,寻觅百岁老人的足迹,是在重读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迈进80岁门槛的作家谭楷将他最新的人物传记作品定位为“故事”,讲述中国故事,这个定位适合国际传播的规律,适合主题文学的传播,显示出创作者的智慧和对历史叙事、人物故事的把握能力。

品读谭楷笔下伊莎白的故事,仿佛在重温中国近现代史,亲切而熟悉。谭楷在书中写到一个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宣告成立时,伊

莎白和她的丈夫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亲眼见证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万众欢呼声中冉冉升起。她是光荣的国际友人,又是刚刚生下幼子的母亲,观礼过程中她不得不离开一会儿,横穿长安街,回到东交民巷的家中给两个月大的儿子哺乳。离开时,大卫对伊莎白说:“你要牢牢记住,我们在观礼台所站的位置,对着‘人民’两个大字——记住‘人民’,‘人民’!”“人民”两个字,被伊莎白牢牢记在心中。这段一语双关的描写,一方面写出了作为母亲的伊莎白的故事,一方面写出了作为中国老朋友的伊莎白对中国的了解和体悟。2021年,中国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目睹四川老少边穷之地天翻地覆的变化,伊莎白由衷地高兴。在书中,读者会读到两条故事线,它们在两个不同的时间但相同的空间里时而交错、时而重叠、时而平行,一条是伊莎白在中国的传奇经历堪称波澜壮阔的人生,这个加拿大女子在百年的时代大背景下融入、参与和创造以及试图努力改变中国乡村社会的人生;一条是作家谭楷对伊莎白百年人生的追溯和寻找、纪实和评述,他如同一个探险者,带领着读者在这个世纪的风云里穿梭、飞翔。

伊莎白·柯鲁克的一生,就像一条丝线,串起了100多年纷繁复杂的历史记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人类学研究、乡村改造、兴办教育……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获得者,107岁的国际友人,携带着跨文化的基因,把她的激情和热血,奉献给了中国的大事大业。这是一部值得中国文学史记载的作品,谭楷在这部书的后记中写道:“我有一点底气,因为我是伊莎白的‘华西坝’老乡,我对她成长的环境以及她做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那条藏彝走廊比较熟悉。”其实何止如此,他一直是带着问题写伊莎白,“她为什么学社会人类学?她为什么会从和平主义者,变成中国革命的支持者、参与者?在她百余年的人生中,都发生了哪些精彩的故事?为什么她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中国?”正是带着这些问题,谭楷重走伊莎白人类学田野调查之路:走进泥巴山、贡嘎山,走进汉源彝乡、赵候庙、杂谷脑河谷的藏羌山寨,研究《兴隆场》《十里店》,六次访问多伦多,“徘徊在静静的多伦多大学校园里,有了书写伊莎白的信心”。开启这本书的写作计划的时候,谭楷“想想自己,毕竟是奔八十岁的了”。可是,他发现,“2013年,已经98岁的伊莎白,每天起得比鸟儿还早,还在孜孜不倦地整理她的人类学专著,与她相比,我还如此年轻”。他用一种紧迫的状态和抢救的姿态写作伊莎白,